



星辰凝視着潮汐

我的家族故事

杜欣欣

通過李杜兩個家族的百年歷史，
本書描述出一幅上世紀中國的風俗畫，
那些永遠消失的、或不知還會存在多久的社會百態和各類人物。

聽著父親的回憶，我記起我姨夫被打成右派時，姨媽是共青團員，作為右派家屬，她經常被批鬥，「那些人想什麼時候批你就什麼時候批你，日子真難過。後來我見到你爸爸，告訴他作為右派家屬多麼苦，你爸爸說他只想到他自己苦，並沒想到他的家屬被牽連的苦。」我想到了我的母親，幾十年來，她的緊張焦慮令她自己也令我苦不堪言，戴罪的父親生活在「罪人」中卻比不戴罪而生活在「非罪人」中的母親少受很多精神創傷，真令人啼笑皆非。

耕種，鋤草，收穫，麥子入庫，豆子進囤，東北「貓冬」季來了，父親卻依然要勞動改造。「1958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，我們去修水渠。聽說中央要給一批改造好的右派摘帽子，我們就要苦戰一冬春爭取早日摘帽。」雖然摘帽是對右派們再次羞辱和欺騙，但當時卻倍者甚累。為了摘帽，他們從事著超出體力的勞動，甚至付出了生命。

「我們去遠處修水渠，到了那裡，就住在一個無門無窗的窩棚裡，那時已是10月底，睡窩棚還能扛得住冷，但水渠越修越長，離窩棚也就越來越遠了，每天清晨走去，晚上走回來，到家的時間也越來越晚。有一天，我和一個老頭一起走回來，他也姓李，解放前參加過「一貫道」，定為歷史反革命被改造，那天天下著小雪，很冷，但我們走得出汗，走呀走呀，怎麼都走不到窩棚，我跟他說：『一家子啊，這樣何時才是個頭啊？』他回說：『兄弟啊，事緩則圓』，有個晚上，實在走不回去了，大家就擠在水渠裡過夜，迷糊幾小時就又上工了，那天夜裡大

概零下三十多度。這段水渠修完了，又讓我們轉去修另一條水渠。大家背著行李趕路，規定時間到達，到了那兒後，立刻砍條子搭地窩棚，條子就是幼樹枝，樹枝架起來，上面蓋點兒稻草，就是俗稱「大馬架」的地窩棚。窩棚裡的地上鋪一點兒稻草，窩棚架上掛水壺，壺裡裝滿白酒。我和一個姓浦的飛行學員，兩人一窩棚。勞動回來，我們只脫棉襖，睡前先灌兩口白酒，再鑽進被子，被子底用繩子捆住保暖。次日清晨，哈氣都凍住了被子邊，鞋子凍硬了穿不上。當時要求每人每天挖一立方土，而且要挖出坡度，雖然是右派自己量土方，但誰也不敢說，因為都想第一批摘帽子。我們挖的可是凍土啊！最初沒經驗，一個十字鏟刨下去，只見一個白點兒，後來會找地縫兒了，一鏟能挖下一塊。天氣真冷，大家幹活很猛，鏟到出汗脫得只剩一件襪子，後來又開始苦戰，先是苦戰十七小時，二十一小時，然後是四十八小時，七十二小時，完全不停地幹活。好在那時還有飯吃，一天吃好幾頓飯，我們不但要挖土，還要把土挑出去，人累得不行了，倒地就睡著了，凍醒了再接再幹……」

在如此的煉獄中，父親病倒了，他感到胸部疼痛，就找衛生員要止痛片，衛生員說：「我可告訴你們了，不到38度不給假。」父親疼得無法繼續，又去找衛生員。一量，體溫38度多，他被批准病假。那夜，我父親一直發著高燒，口渴難耐時就伸手在窩棚外抓把雪吃。次日高熱不退，這樣癱了一個多星期，除了阿司匹林也沒有其他的藥，彼時，被父親認為「好」的隊長和指導員因為右傾已被撤職，換上來的領導對右派都很苛刻。

有些勞改隊開始「放衛星」了，所謂的「衛星」就是每人每天挖了四個土方的凍土。父親所在的勞改隊也開始闢下土方，找日子放衛星。父親病得太重，終於被批准回大營，他疼得走不了路，在難友攙扶下，慢慢走回去。父親找到一點兒白藥和著燒酒吞下，但病情仍未好轉。他跟著送糧食的大車到分場醫院，醫生一檢查，說他患了大葉性肺炎和胸膜炎，馬上住院。住院期間，父親聽說挖水渠的人又轉移到了更遠的地方，轉移時，他們遇到大煙泡（暴風雪的俗稱），大煙泡後，人們發現右派越獄吊死在一棵很小的樹上，病稍稍好轉後，父親偷偷跑回北京的家。但到家不久，他又病了。因擔心被發現，他也不敢到醫院診治，找同學的醫生妻子要了一點藥就匆匆回東北農場。

我完全不記得那次父親回家，但卻記得父親每次回來，我總是特別高興。他回來後，不但陪我玩兒，還給我買一些難得的小東西，那年，我跟著父親去天橋，見路邊有人賣小松鼠，我鬧著要買：「爸，你信上說，你們那裡有好多小松鼠，要帶一隻回來給我。」父親說：「那不是松鼠是禿鼠，太貴了，不能買。」但他心軟，禁不起我磨，就買了下來。那時中國的城巿幾乎無人養寵物，我自然極為興奮，拎著籠子，看不夠。回家的路上，又收穫了很多驚奇和羨慕的眼光。一到家，母親一兜涼水澆了過來：「人都沒吃的，你還給孩子買這個！」父親垂著手聽母親抱怨，也不聲辯。那段時期，中國還未完全從大饑荒中恢復，母親這麼數落父親也並非沒有道理。數月後，那



父親回家，大概是1959年。
(作者提供)

對禿鼠死了，父親已離家。我傷心地將牠們掩埋在葡萄樹下，次年葡萄大豐收。我還記得，父親給我買過一朵帶珠子的粉色絨花，我寶貝得很，每天睡覺時都把它壓在枕頭下。

然而，父親每次回來都會給母親帶來壓力，1964年4月26日，在寫給父親的信中，我問候了父親的病。在信紙空白處，我母親寫道：「你病況如何？如果時間容許最好回四川養病，路費不成問題。如果時間不容許，我現設法找一間房子，可是不是那樣容易的，儘量找。如果這幾件事都辦不成，我立刻給你寄藥品和糖，是否在勃利醫院養病？回軍樂隊療養不可能，既然領導說了，我就不想再去說了。欣慰昨日未歸，因文工團無事

去接，今日歸來，昨天是孩子的生日，今天帶他去照相……，只是掛著你的病，好幾天睡不踏實。」（我父親沒有保留我母親的信，但保留了我的信，他們之間的通信只有這一封了。）

每次為父親借房子，母親單位的人就知道他的右派丈夫回來了。從東北，父親為母親帶回蘑菇之類的特產，也給極愛乾淨的母親帶回來一身的蝨子，我還記得母親為父親洗頭，洗燙衣服。我父親幾乎不做任何家務事，而母親卻極愛整潔，非常勤快。粗心的父親丟失過車票和鋪蓋，最後都是母親替他補上，父親在東北時，母親曾偷偷給他寄過報紙，報紙裡夾帶了食品。靠了母親的食物和糧票，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時期，父親撿回一條命，而母親卻因給父親寄東西多次遭到批評和批判。

第四節 飢餓線上

當時最好的治療是吃飽飯，可惜好景不長，發糧票的人請假回家，病人們領不到糧票。父親說：「當時醫院食堂規定必須買主食才能吃飯，我怕斷糧，每頓飯只敢買半兩飯票的主食，實在餓得受不了，就跟一夥人下山去買泥鰍魚吃。」黑龍江河冬天結冰，但人們會在冰上鑿洞捕魚，特別是饑荒時期。「一天，我到那裡時，泥鰍魚已賣光了。眼看著一段小坡，我就是邁不腳步。低頭喘息時，突然看到地上丟了兩條泥鰍魚，我撿

起來，拍掉上面的沙子就吃下去。一位老人正好路過，他看到我的慘狀，就說：「兄弟啊，我看你餓得厲害，我那裡還有一碗飯，你要是不嫌埋汰（東北話聽聽之意）就拿去吃吧。」父親來到老人的家，端起那碗飯，「那高粱米飯隔在火爐上已經變了，不過我很快就吃完了。老大爺，活著囉！」父親說。

1959年初從北京回到東北後，父親就被分派去基建大隊，幹的是和泥脫坯。脫坯就是將潮溼的泥土放入模子裡踩，踩實了，再從模子裡倒出來，曬成泥磚。俗話說：「農活三大累——脫坯，蓋房，割麥子。」父親回憶道：「那是很重的活兒，不久我就得了一種怪病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。但有人彙報說我是裝病，為了試驗我是否裝病，指導員站在操場的另一邊突然叫我的名字，要我跑步前進，我在屋子裡聽到了，出門跑步，跑了兩步就摔倒了，臉都摔破了。他才確定我沒有裝病，到了醫院，確診是周圍神經炎。那時不只我一個人生這種病，有人因此終生殘疾。」父親再次入院。出院後，他被派去割條子。條子可以架窩棚也可以編筐，還可曬乾當柴燒。父親所在條子班都是病號，其中有位右派名叫屠雙。他50多歲，曾在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館任過職。據說駐美期間，他連工作邊念哥倫比亞大學，回國後娶了蘇州的名門閹秀，一天，屠雙突然倒地死了。他死後，我父親編著編著筐也倒下去不省人事，幸虧勞改隊的舒醫生之前經歷過屠雙的死。他為父親做了必要的治療，

並緊急送醫院。父親患了克山病，卻撿回一條命。

1958年是父親勞改的第一年。那時幹活雜業，卻還能吃飽。「秋收時，紫色、黃色、紅色，好多顏色的胡蘿蔔，長得可好呢，大家邊收邊吃。」這是父親回憶中難得的愉快經歷。還在勞改營，他不知道那時的中國已在「總路線」、「大躍進」、「人民公社」的三面紅旗下，大煉鋼鐵，大放衛星，大興共產浮誇風。在極為愚昧的行政指令下，中原大陸即將進入大饑荒時期。

1959年夏，父親開始挨餓了。「春天時，食物就不夠了，我被派去採野菜。山韭菜、倭瓜梗葉……，我認識了很多能吃的野菜。野菜被採挖光了，又開始吃所謂的『代食品』（代食品是原本不能成為食物的物質，比如用小球藻做的食品，海地饑荒時，人們就吃一種名為「特雷」的泥餅）。後來我們完全沒有存糧了，只能在收割時吃點東西，收什麼吃什麼，收麥子就把麥粒搓一搓吃，收苞米就吃生苞米，收豆子吃生豆子，但那時還能吃個半飽。」1959年秋收後，糧食越來越少，餓死病死勞累死的人越來越多，活著的人也越來越不做人樣了。父親記得一個叫耿志的右派，他原是13級幹部，皮膚很白，長得很英俊，但挨餓時渾身上下都是黑黑的，非常潦倒。他在腰上拴條兒草繩，上面掛著一個小鐵筒，因為那筒子能多裝點稀飯。父親還記得一個姓吳的右派，他原在民盟擔任高級職位，本來也是個很能幹很乾淨的人，一天早晨起來，父親聽到他在哭，原來是晚上餓得尿了床。

我和父親談起《夾邊溝記事》⁶⁶：「他們在死前要浮腫，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，生命就要結束了。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，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，裡邊包著一包水。眼睛睜不大，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。他們走路仰著臉，因為眼瞼的褶皺穿得看不清路了，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清楚……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，就像是咧著嘴笑。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，嗓音變了，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，嗷嗷的。」說到這裡，我難過得流淚，父親聽著，沒有淚，他輕聲說：「我們那裡也是那樣的，死前的人都浮腫。1960年秋天，我去一個分場，看見一個空屋子裡堆滿死屍。」

甘平說，「從1959年下半年起，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。我爸爸當時在伙房工作，看著人來偷吃，來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專家，餓成那樣還管什麼臉面。我爸爸也幸虧在伙房才沒有餓死。」

因為死人太多了，當局對右派的控制似乎鬆動些，父親聽說「無論摘不摘帽子，右派都可以回北京。」不久，右派們就被集中到總場，所有的人都能離開勞改農場，能回家而感到高興，因為不願家人看到自己的悲慘形象而傷心，很多難友傾其所有尋找吃食。有人買了鴨子，卻不想剛吃完鴨子就被撐死了。有的人去十來里地外的合作社買豆腐，扛著五公斤一袋豆

附註 1. 楊慶堃，《夾邊溝記事》，廣東：花城出版社，2008年9月。

難走回來，卻倒在水壩上死去。

父親依然記得楊泰泉，他牢記著當右派的教訓「禍從口出」。從1958年4月到農場，直到1961年1月餓死，他從未開口說過一句話，2014年5月我去印度，一個夜晚，在喜馬拉雅山中的Badrinath神廟附近，人們指給我看山上的一盞燈，那是一位24歲的修行者，在那裡已經修行了六年，修行期間，這個青年從不說話，自願沉默在大自然的神聖之中，人們稱他靜聖，但是楊泰泉絕不自願當靜聖！

1960年秋，右派汪森割完了大豆，挑著行李回駐地時倒在了路邊，難友楊崇道親手埋葬了他，右派吳中淮因寒冷飢餓於1959年11月突然去世，他的屍體放在地窩棚裡，兩天後才被難友們掩埋於附近的清涼山，半個世紀之後，吳的長女吳江海北上尋找父親的屍骨，兩次均失望而歸，據吳永良記載，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個夜晚，在收割大豆之後的田野裡，勞累凍瘡奪去了四個右派的生命，在850農場勞改的右派中，有34人去世，47人下落不明。「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」

楊泰泉、吳中淮、汪森……，這些受難者最終被楊崇道先生記錄在《一份「陽謀」災難的民間檔案——中央單位「右派」流放北大荒名單》中，為了這個名單，楊先生花費七年的時間，自費奔走十餘個省市。這本右派名錄不僅是一份千人名單，也是反右運動受難者的存簿。

我父親挺了過來，甘培根也挺了過來，可是他卻成了殘疾人。

據甘育群回憶：「我那時還不懂右派是什麼，只記得有一天，媽媽帶著我和5歲的弟弟到火車站送爸爸，說是要去很遠的地方，事後我才知道父親被送到北大荒853農場勞動改造。爸爸一走，我們的日子也一落千丈，母親因為父親的問題從黨報調到一所中學教語文，我們家搬到了南城香廠路。我現在還能清晰地想起來，那是一座舊社會妓院改造的房子……，那時我只感到爸爸每星期都會給媽媽來信，而且是一寫好多頁紙，在信中爸爸總是講北大荒的趣事，很少談及他的痛苦。爸爸信中告訴我們，他被分在農場炊事班，這是農場最好的工作了，只是每天要在零下40度的氣溫下從河裡挑幾十擔水。好在是炊事班，起碼可以填飽肚子，在60年代初才沒有被餓死，我知道封家信是支撐父親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的精神支柱，母親不離不棄的愛情、兒女天真無邪的親情給了父親活下來的信心和勇氣。他每封信都表示自己一定認真改造世界觀，爭取早日摘掉「右派」帽子，但是沉重的心理壓力，艱苦的勞動環境，落後的醫療條件，終於使他病倒了……。」

在糧窩島，甘培根每天要到冰河裡挑幾十擔水，半夜還要挑著擔子，走幾十里地，給連夜工作的拖拉機手送飯。他走著走著，感到關節疼痛，最初不以為意，忍著疼繼續走，沒想到，連續幾天，他的關節一直疼，而且越來越厲害。先是疼得無法走路，然後無法站立，最後無論怎樣都感到疼痛，他開始發高燒，躺下之後就爬不起來了，當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膿性關節炎，如果打一兩針青黴素，這病就可以治癒，至少

不會惡化到那樣的程度，可是當時853農場根本無藥。

據甘育群回憶：「他發著高燒，孤獨地躺在場區醫院兩個多月。當時通訊條件很差，爸爸在信中又不願把這個壞消息告訴母親，所以當母親得到消息時，父親的病已到了醫院認為非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的時候。」農場通知甘培根的妻子：「人已經不行了，妳要來就趕快，但不能保證他還活著。」

接到消息後，康力當機立斷，「記得那天我放學回家，只見母親在家中匆忙準備行裝，說是要隻身一人去北大荒救父親，母親是一位膽大心細的女人，幹事激辣果斷，給我留下些生活費，叮囑我照看好小弟，毅然地提著個旅行袋去了火車站。當她一人深夜從北大荒小火車上下來時，四周是一望無垠的荒野，茫茫黑夜，不時還聽到狼嚎聲。下車時列車員手指遠方一排燈光，告訴母親朝燈光處走就是醫院。母親後來告訴我們，那時她只想早點到醫院看看父親的病情，所以當時一點都不怕，她右手握根本棍，左手舉著手電筒，踏在積雪融化的茫茫荒野上，朝著遠處的燈光走去。」（摘自甘育群回憶）

康力見到丈夫，發現他還活著。同屋的人說：「沒人能靠近他，一陣微風，一點兒震動，都會使他疼得直打哆嗦，都會讓他疼得低聲呻吟，這幾天他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，無聲無息，猶如一具石像，可是當人走近，這石像的嘴角就會抽搐，疼啊！」

甘平說：「必須帶他離開這裡，必須救他！那大概是媽媽當時唯一的想法和盡力去做的事情。」在父親生命垂危時刻，母親同醫院派出的大夫和護士用擔架把父親抬上回北京的

火車。」「我看見爸爸從火車窗口抬出來，抬的時候，大人們一直說：『輕一點兒，慢一點兒。』我不能走近爸爸，怕震動讓他更疼，我真想和他說話，哪怕遠遠地叫聲爸爸，可是他已經完全不省人事。」

將丈夫帶回北京之後，康力四處奔波，輾轉找到協和醫院的周大夫。這位大夫是梁啟超的女婿，也是留學歸來的，應該是當時最好的骨科醫生。周大夫為甘培根切除了壞死的關節。因為當時沒有人工關節，大夫只能用鋼釘將腿固定連接起來，他的左腿是保住了，但卻短了一截。

那年甘培根35歲，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拐杖，而且要穿一種特製的鞋，那條腿又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彎曲，下蹲十分困難。在中國，蹲式廁所占絕大多數，個中之艱難，旁人難以想像。我父親說：「年輕時的甘姑父十分活潑，多才多藝，會拉二胡，會畫畫，還會唱京戲。他和力姑媽談戀愛時，經常騎車去野外郊遊，他有180公分高，因為身材高大，他打排球籃球，也打網球。他還喜歡跳舞，在交誼舞會上，他的舞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」我成年後，第一次見甘姑父，他總是沉默寡言地坐著，站起來時，殘腿使他身體總是左傾，整個人矮了一大截，我根本不能想像他當年的翩翩風采。

我父親被召集到農場總場後，並未如願回家，他又被分發到虎機農墾局的燒炭隊。「燒炭隊有四十多個人。我們從雲山畜牧場出發，走啊走啊，走進一片茫茫的雪原。到那裡一看，燒炭隊原來是勞改隊，原有的勞改犯人遷走了，留下了一座很

大的窩棚。」父親回憶著。「我走進窩棚，只見兩排條子床，床間的火坑。草棚上每隔一段放著一塊玻璃採光。晚間，掛著的柴油燈冒著黑煙，火坑裡燃著木柴，黑暗，寒冷，煙熏火燎，我想起高爾基的《在底層》。」

周圍的森林已被胡亂砍伐過，炭窯外堆著永遠燒不熟的生炭。儘管如此，父親還要每天上山砍樹。從事這樣重的體力勞動，一般人每天需要兩三斤糧食，但當時每人只配給七兩糧食，不幹活的人只有三兩，而那些所謂的糧食不過豆餅之類，伐木的山並不高，但父親總得爬不上去，好不容易爬上去了，先坐下來歇很久，才能有力氣拉鋸，一個人一天鋸不下幾段木頭，但不去伐木，就吃不上配給的七兩糧食，父親總得在雪地裡找東西吃，運氣好的時候能撿到木耳。

白天幹完活，右派們撿點木頭回去燒。夜晚，地窩棚裡的四十幾個人絕望得無話可說，只有木柴燃燒的劈啪聲。因為飢餓，有人開始偷別人的東西吃，熄燈後，四處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人們偷偷地吃著家裡寄來的食品。父親說：「那時，我們在山上找到一種薄薄的東西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。帶回來，把它放在搪瓷盤裡炒一炒，反正嚼碎了可以填肚子。我們稱它『餅乾』。」一天晚上，在一片沉默中，坐在旁邊的老周悄悄地捅了捅我，背著手遞過來一塊樹皮，那樹皮可是寶呀，我偷偷撿過來，吃了。」

「那時餓死的都是強勞力，他們身體棒，需要的多。我當時還算能幹活的，不能幹活的那些人一天到晚躺在床上。窩棚

外掛了一塊很厚的草簾子保暖，白天也很暗，中午回去吃飯，剛進窩棚時什麼都看不見。待一會兒，就看到玻璃上透過來的一束光，順著那束光慢慢看過去，火坑裡的火有些已經熄滅了，有些還有餘燼。再仔細看去，就能看到躺著的人的哈氣，我們知道他還活著。出去打飯，就給他帶點兒回來，有的人還能掙扎著起來吃一點，有的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，就在那裡躺著。次日清晨，如果看不到他呼出來的水氣，就知道那人沒了。」

「有個人死了，我只知道他比我歲數小。我們一行人把他抬出去，外面到處都是雪，抬的人也沒力氣在雪地裡挖個坑埋他，就找個像坑的地方，抓幾把土，撿一些樹枝，就算把他埋了。」

唉，那一片雪色的北大荒，那深雪中的受難者，我的父輩啊！

很多人餓死後，伐木隊的倖存者回到了雲山畜牧場，父親回憶道：「那年很冷，雲山農場凍死了一些羊。破天荒地，我們買到了羊肉，還發了一斤白麵。那是幾個月以來的第一頓飽飯，老周連帶毛的羊皮都吃了下去。次日通知去總場報到，發給我們兩斤餅乾。我們等著車子，就把餅乾吃完了。車子來了，卻熄了火，我們去推車。我滑倒在車下，突然車子發動了，我被推著走，幸虧有人看到，把我拽了出來，我又撿了一條命。到達 850 總場後，食堂開飯，吃的是很稠的小米粥。我吃了一盆不飽，又吃一盆，一連吃了十四盆。我這輩子從來沒吃過這麼多。第二天，我們去洗澡了。我已一年多沒洗過澡了，洗著洗著，鼻子開始流水，過了兩三天，鼻子就變黑了，原來是凍傷，就是從宿舍走到食堂的那一百米的路上凍的。」